

# 社会史视野下的地方志利用与研究述论

李晓方

**提 要:** 地方志既是历史研究的史料, 又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在传统史学中, 地方志多被视作一种史料, 用以重建和解释社会历史进程。方志界始终将地方志作为研究对象, 基于当下对方志编纂的关怀, 对古代方志亦不乏具有社会史意义的批判。在社会文化史的视野下, 地方志被视作一种“文本”, 揭示其中暗含的权力、观念、目的和意义, 成为相关学者的基本研究取向。通过梳理和述评, 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 提出进一步拓宽地方志研究的途径。

**关键词:** 地方志 社会史 利用 研究 述论

中国地方志的种类繁多, 有总志、通志、府志、州志、县志、乡镇志、卫所志以及各种专志。据不完全统计, 留存至今的地方志有近万种, 占现存古籍的 10% 强。数以万计的地方志, 既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历史过程, 而其自身又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长期以来, 地方志一方面被当作一种史料, 广泛用以重建和解释社会历史进程; 另一方面, 作为一种文献形态, 其源流、性质、体例、功能、特征、现代意义等, 又长期是学界尤其是方志学界的研究对象。近十年来, 在社会文化史视野下, 地方志又被视作一种“文本”, 揭示其中暗含的权力、观念、目的和意义, 又成为新的研究取向。本文试图对地方志的利用和研究现状作一简要述评, 并从社会史研究的角度, 提出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途径, 以期抛砖引玉。

## 一 地方志作为史料的利用

地方志历来是历史研究的史料, 但其受重视的程度又古今迥异。在传统史学的视域中, 地方志虽多被视作史籍之一列入史部地理类, 但其记事的可靠性又常遭史家质疑。章学诚就批评清代所修方志“全无征实”<sup>①</sup>。在清代以前的正史纂修中, 几乎不采用地方志的记载, 亦如章学诚所言“自有方志以来, 未闻国史取以为凭也。”<sup>②</sup> 即便是私家著作, 对地方志的利用也是心存疑虑而慎之又慎, 主要将之限定在历史地理的范围之内。顾炎武的巨著《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对地方志的大量征引, 在其时的史学著作中并不多见。

20 世纪 30 年代, 在社会史大论战的背景下, 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得到了空前重视。顾颉刚、陶希圣、鞠清远等人, 率先在《禹贡》、《食货》等杂志上纷纷撰文, 讨论地方志在揭示中国历史发展动力与脉络中的史料价值, 探讨利用地方志的方法<sup>③</sup>。有的学者则付诸实践, 大量利用地方志素材进行历史研究。如梁方仲的《一条鞭法》(1937 年), 就通过利用 1000 多种地方志, 厘清了一条鞭法在各地区的实际推行情况, 成为成功利用方志资料探讨王朝制度与地方社会的经典著作<sup>④</sup>。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可谓成功利用方志资料于移民史与人口史研究的先驱。他于 20 世

① 章学诚著, 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第 841 页,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版本下同。

② 章学诚著, 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方志立三书议》, 第 829 页。

③ 陶希圣《搜读地方志的提议》, 鞠清远《地方志的读议》, 《食货》1934 年第一卷第二期, 第 40~45 页。

④ 刘志伟、陈春声《序》, 载梁方仲《中国社会经济史论》, 第 17 页, 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纪30年代撰写的毕业论文《湖南人由来考》，利用湖南诸府、州、县志中的五种，厘清了出自汉族血统的湖南人的由来<sup>①</sup>。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创始人傅衣凌，在回顾其学术历程时曾经坦言，“开始懂得地方志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这就为后来我的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础”<sup>②</sup>。在同期的海外中国学者中，地方志实际是研究中国史的最大资料来源之一。何柄棣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可谓其中成功利用方志资料进行研究的经典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青年学者何炳棣通过对卷帙浩繁的中国方志作抽样研究，揭示了地方志中大量记载的“丁”与“口”和实际人口数并无对应关系，得出了其中的“丁”只不过是赋税单位的结论，为中国人口史和赋税制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sup>③</sup>。此外，美籍华裔学者萧公权的《中国乡村：十九世纪帝国政权对人民的控制》一文，对清朝赋税体系的研究资料也主要来自地方志提供的数据<sup>④</sup>。

由于受到特定社会政治环境的制约，眼光向下的社会史研究路径，在随后的较长时间里，始终处于史学界的边缘地位。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地方文献以及民间文献等在国内的史学实践中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和利用。这种状况直至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研究复兴后方得到根本扭转，地方志的史料价值从此受到空前强调，地方志的利用广度大为拓展。曹树基继承和发扬其师谭其骧的研究路径，主要依据地方志史料成功重建了明清时代中国的移民史与人口史<sup>⑤</sup>。台湾学者刘石吉主要依据地方志开展的明清江南市镇的系列研究，对大陆江南史尤其是江南市镇经济研究产生了巨大冲击，可谓经典著作<sup>⑥</sup>。随着社会史研究的纵深推进，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利用地方志进行明清史研究几乎成了一种时尚，其论著不胜枚举。择其大端，如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年）、刘志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1997年）、唐力行的《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9年）、张研的《清代社会的慢变量——从清代基层社会组织看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演变趋势》（2000年）、梁其姿的《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2001年）、常建华的《明代宗族研究》（2005年）、陈江的《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2006年）、黄志繁的《“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2006年）、钱杭的《库域型水利社会史研究——萧山湘湖水利集团的兴与衰》（2009年）等，均大量利用了地方志的素材。尤其要指出的是，台湾学者梁其姿，为了统计清代的慈善组织，利用方志竟达2600余种<sup>⑦</sup>。在一本著作中，征引地方志数量如此之巨，实属罕见。至于单篇论文，更可谓俯拾皆是。通过检索发现，在近20年来的历史研究中，仅以“基于某某地方志的考察”、“以某某地方志为考察中心”、“从地方志看某某问题”为副标题的论文不下百篇。以上简述，可谓挂一漏万，但从中不难看出，利用地方志进行的研究就其主题而言，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诸领域；就地域范围来看，几乎涵盖了华南、江南、华北、华中等全国各地。常建华还专门撰文探讨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认为地方志是研究地域史、区

① 陈其泰 《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第353~35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傅衣凌 《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文史哲》1983年第2期。

③ 〔美〕何炳棣著，葛剑雄译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三联书店2000年版。

④ Hsiao Kung - ch' uan.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⑤ 曹树基 《中国移民史》第五、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人口史》第四、五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2001年版。

⑥ 李伯重 《刘石吉著〈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的评介与感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⑦ 梁其姿 《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

域史的基本资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切入点<sup>①</sup>。

在海外学者中,〔美〕施坚雅的《中华帝国的晚期城市》(2000年)、〔美〕萧邦齐的《中国的名流与政治变迁——20世纪早期的浙江省》<sup>②</sup>、〔美〕森正夫的《明清史论集》(第三卷,2006年)、〔日〕谷口规矩雄的《明代徭役制度研究》(1998年)等著作均大量征引地方志资料。尤其在日本史学界,正如山根幸夫所指出的,“利用地方志已成为一种常识,无需加以说明”<sup>③</sup>。

## 二 方志学界对传统方志的批判

地方志不仅是研究的史料,历来也是学者研究的对象。对地方志的研究,大概有两个基本角度:一是从方志学角度进行的研究;二是从历史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必须说明的是,这样区分并不是说方志学家与历史学家分属二途,事实上大多方志学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只是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其旨趣关怀存在较大差别,故有必要分而述之。下面就从社会史的角度,先就方志学界对传统方志的批判作一简要综述。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方志学的成立视为清代学术取得的一大重要成就,并认为“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sup>④</sup>,将清代的章学诚视为方志学的创始人。章氏因其在方志学史中的突出地位,其方志学思想与理论历来是方志学界关注的焦点,研究成果颇为丰硕<sup>⑤</sup>。当然,对地方志的理论探讨,实际上可追溯至自地方志产生以来,这方面的介绍也已蔚为大观,如台湾林天蔚《地方文献论集》、黄苇《方志学》、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均有详论,兹不赘述<sup>⑥</sup>。清代方志纂修盛况空前,不少著名学者参与其中更显特色,如顾炎武、章学诚、戴震、方苞、钱大昕、洪亮吉、梁启超、孙诒让等人,他们不仅亲自主持方志编纂,而且通过方志的序、跋或专门论著,总结修志经验,从不同侧面对地方志进行理论探讨。晚清至民国,再度掀起修志高潮,涌现出了王棻、吴宗慈、余绍宋、李泰棻、朱士嘉、傅振伦、张国淦等一批著名方志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方志学有了新的发展,方志学者承前继起,来新夏、陈桥驿、刘光禄、薛虹、黄苇、刘纬毅、张革非、吕志毅、王德恒、陈光贻、杨军昌、仓修良、巴兆祥等人,均有专著探讨方志学说。

地方志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地方志应该编纂些什么,以及该如何编纂,这是方志学界讨论的核心问题。具体到清代方志学界,章学诚的讨论最为详尽透彻。章学诚反对以戴震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将地方志定性为地理书的观点,认为地方志应该是一种历史著作,其记事范围不应只局限在地理沿革,而应扩展到人物与文献,并试图借此提升地方志在史学中的地位,实现其为“国史取材”和“经世致用”的功能<sup>⑦</sup>。章学诚对地方志乃史书的定性,正是其大受梁启超推崇的主要原因。章学诚从“志属信史”、“志属史体”、“志乃史裁”的理想设计出发,主张地方志

① 常建华《试论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年第七卷,第61~74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② 转引自陈桥驿《陈桥驿方志论集》,第178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 〔日〕山根幸夫著,田人隆等译《中国史研究入门》(增订本),第2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04~305页,中国书店1985年版。

⑤ 邱新立《二十年来章学诚方志理论研究综述》,《福建史志》2003年第4期。

⑥ 林天蔚《地方文献论集》(上册),南方出版社2002年版;黄苇《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⑦ 杨念群《章学诚的“经世”观与清初“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建构》,《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的编纂原则亦应秉持“史学法度”，并以此为标准，对以前的地方志展开尖锐的批判。他对其时地方志的基本评价是“方志久失其传，今之所谓方志，非方志也。”他不满足于方志编纂者的人员构成和基本素养，认为其中多为不懂史学的文士，他们好“夸饰文辞”，甚至“信笔乱填”和“猥滥庸妄”，而不明方志之责在于“期明事实”；至于文人修志多图私利而缺乏责任心，则更为章氏所痛恨，进而提出了“文人不可修志”的主张。章氏亦不满于方志在选材上的局限。他注意到方志取材多源自六科档案和望族家乘，极少深入民间进行实地调查，故其记人记事多集中在地方官员与士绅文人，而鲜及穷乡僻壤的下层民众。章氏更尖锐地批评了方志编纂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营私现象，如地方官员与士绅文人，往往贪载艺文，即便是风云雨露无关怨创之作，亦滥收其中，以期传世不朽；更有甚者“贿赂公行，请托作传”，导致方志成为文人游戏、应酬文字或私家墓志寿文的汇集而“全无征实”。此外，章氏亦注意到方志人物传记中空洞无物与脸谱化的现象<sup>①</sup>。清代其他学者对地方志的批判亦散见于他们的方志序、跋之中，如戴震也注意到地方志的记人记事，往往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关照到下层民众，说地方志只能是多载“富贵之家”而鲜及“穷巷下里”，“遗者盖多，书其所知而已”<sup>②</sup>。

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在民国政府倡修方志的背景下，方志学一度成为研究热点。王棻、吴宗慈、余绍宋、李泰棻、朱士嘉、傅振伦、张国淦等人对传统方志均有论列，在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主导之下，传统方志中的皇朝史观成为其时批评的主要目标，但其批判往往颇显空疏。相比之下，傅振伦比较注意吸收清代方志学界的研究成果，他的《中国方志学通论》是其时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该著设有专章《方志之通病》，对传统地方志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判，概括了其中普遍存在的十大通病，不过其所涉内容几乎没有超出章氏所论范围，这大体反映了民国方志学界对传统方志批判的一般状况<sup>③</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方志编修工作受到重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度掀起修志高潮，方志研究亦应时兴起，但不久修志工作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sup>④</sup>。20世纪80年代，全国范围的第一轮修志工作全面启动，方志研究从此大盛，并一直延续至今。对传统方志史料价值的重新批判与评估，是现代方志学界的重要论题。20世纪80年代，为推进全国地方志的编纂，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先后汇编了《中国地方志总论》、《中国地方志分论》、《中国地方志论丛》、《中国地方志译论》、《中国地方志论集》，收录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方志学界诸多专家的近百篇文章。其中傅振伦的《方志——史料的宝库》、邬烈勋的《中国古代史料宝库——地方志》、蒋光田的《地方志是一座宝库》、潘新藻的《地方志是重要的历史文献》等论文，以明确的主题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方志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等研究领域中的史料价值。此外，王重民的《中国地方志》、朱士嘉的《中国地方志浅说》等论文亦拟就旧志的作用、地方志的价值等章目，全面讨论了地方志的价值尤其是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学者们普遍认为，地方志可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因其更贴近基层，故更能反映一般民众的社会生活，旨在强调其史料价值。

在充分肯定传统方志史料价值的基础上，学者们也注意到其中的弊病。来新夏《中国方志

① 章学诚的上述方志学思想，可详参其《方志立三书议》、《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州县请立志科议》、《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等文，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

② 戴震《汾州府志例言（十则）》，载乾隆《汾州府志·例言》。

③ 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第40~55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④ 邱新立、王芳《中国五六十年代地方志的编修始末及成果概述》，《中国地方志》2000年第1期。

学概论》是现代方志学界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在第二章历代的方志编纂与研究中,谈到了旧方志的局限性,重点批评了旧方志的地主阶级属性和天命论的唯心史观<sup>①</sup>。谭其骧《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一文,基于自己多年从事历史地理的研究经验,以地方志对古城遗址、建置沿革、历史人物、地方灾异的记载为例,指出了地方志的记载未必可靠,故而不可轻信<sup>②</sup>。武汉大学《中国图书知识》编写组的《地方志简介》一文,则对传统方志宣扬封建意识形态的孔孟思想、对历代农民起义的污蔑、编纂取材的局限等方面存在的流弊进行了批判<sup>③</sup>。不过,与方志学界普遍强调和论证地方志的史料价值相比,对地方志史料价值局限性的批评只能算是支流。

### 三 近十年来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地方志研究

近十年来,随着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渐趋合流,社会文化史研究悄然兴起。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注意分析历史文献背后的权力与观念。这一研究取向,在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激荡下,更趋活跃与发展。地方志作为一种重要的地方文献,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颇有从研究史料走向研究主题的趋势。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地方志研究,其旨趣大异于方志学界,他们将地方志作为一种包含着建构成分的“文本”,并试图通过对其产生过程的解构,探讨由此映射出的社会历史情状、权力和观念。不过,这一研究取向尚处朦胧阶段,未见专门著作,只有少数论文,下面就所见成果作一综述。

探讨影响地方志编纂的原因,学者们表现出了较浓厚的兴趣,分别从社会治乱、政府控制、宗族势力、讲学风潮、文化观念、一统志的纂修等多个角度进行了颇具启发性的研究。例如,陈春声、冯玉荣讨论了社会治乱的变化与政府控制的张弛对地方志编纂的影响<sup>④</sup>。程美宝、陈蕴茜等人则对晚清民国社会生活和读书人知识体系、价值观念的巨变,如何体现在其时的地方志编纂之中,进行了很好的研究<sup>⑤</sup>。吕妙芬则注意到晚明区域讲学风潮对地方志纂修和书写的影响,视角新颖<sup>⑥</sup>。有的学者分析了地方宗族势力、族群关系对地方志编纂的影响,如(美)戴思哲(Joseph\_ Dennis)通过考察万历《新昌县志》,认为这部县志实质上修纂成了当地吕、潘和俞三个显赫家族的“公共家谱”<sup>⑦</sup>。明清一统志的纂修对通志和府、州、县志的纂修起了推动和规范的作用,如张英聘的《论〈大明一统志〉的编修》<sup>⑧</sup>、《论〈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对清代地方志的影响》<sup>⑨</sup>对这方面的内容作过探讨。笔者也曾从明清时期多次修撰的《赣州府志》风俗志入

① 来新夏《方志学概论》,第94~9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中国地方志论丛》,第8~2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③ 地方史志研究组编《中国地方志总论》,第82~93页,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1年版。

④ 陈春声《嘉靖“倭乱”与潮州地方文献编修之关系——以“东里志”的研究为中心》,《潮学研究》1996年;冯玉荣《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与地方志的编纂——以〈松江府志〉为例》,《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7期。

⑤ 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三联书店2006年版;陈蕴茜、曲兵:《论清末民初士绅与江浙地方志的变化》,《江海学刊》2004年第4期。

⑥ 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⑦ (美)戴思哲(Joseph\_ Dennis):《谈明万历〈新昌县志〉编撰者的私人目的》,王鹤鸣主编《中华族谱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⑧ 《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6期。

⑨ 《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手,对“崇文向学”与“尚武好斗”两种看似相悖却密切关联的地方风尚进行了解读,指出明清地方志对民风习俗的描述,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是修志者身份和立场,二是当时当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秩序,三是修志者试图向读者传递何种信息、哪些人群属于他们假设的读者等<sup>①</sup>。

任何文献史料均非透明,它们都经过了权力、观念、目的、意图等因素的“污染”,这在学界渐成共识。揭示深藏文本背后的上述因素,是新近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又一重要兴趣点。谢宏维通过对清至民国《万载县志》的分析,认为当地土客权力关系及其变化,渗透在地方志的编纂之中,从而指出,地方志既是地方各种势力角逐的产物,又是地方各种势力角逐的对象<sup>②</sup>。罗艳春通过对清中叶万载县的书院考察,认为相对于族谱,县志对族学的记载体现了地方宗族势力的兴替<sup>③</sup>。程美宝以清末民初的广东乡土教材为文本,深入剖析了在清末新政背景下,广东地方上的读书人如何在其中运用一套新的话语,尝试在观念上重新定位地方与国家的关系,表现他们对新式教育的认识以及对国家观念的理解<sup>④</sup>。〔日〕佐藤仁史也做了与程美宝类似的研究,他以乡土志和乡镇志为切入点,探讨了由此折射出来的清末民初在乡知识分子的文明观与乡土观<sup>⑤</sup>。余新忠以明清江南地方志中的“孝友传”为资料基础,着力探讨了方志“孝友传”之类文本的限度、其背后所蕴涵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内涵及编纂者的意图<sup>⑥</sup>。钱杭对登载在明代弘治《萧山水利志》中且长期被视为维护湘湖公意及公利的最重要的历史授权依据——《英宗敕谕》进行了严密考证,认为那其实是民间精英为了维系集团利益和权力秩序而改编和虚构的<sup>⑦</sup>。台湾学者李文良注意到清初台湾地方志赋予“客家”极其负面的形象,分析认为这些文本实质上是当时福建漳州、泉州籍人对广东潮州籍人的书写,而并非长期以来一直被学者们视为“讲客家话的客家人”之历史;进而强调了反省以往阅读方志的方法,注意方志的作者及其意图的重要性<sup>⑧</sup>。〔美〕范德(Edward L. Farmer)对明代地方志中的插图进行了颇具启发性的研究,指出方志提供的这一景象显然已被学者和下令刊行方志的官员的关注点、预设和价值观所涂抹,表现了作者急于在更宏伟的明朝方略中为自己的地区要求一席之地的意图<sup>⑨</sup>。台湾学者王明珂则从人类学的角度,试图透过道光《云南志钞》的书写、出版行为,探索作者王崧的情感、意图如何影响他在种种社会情境“结构”下的书写及其他行为<sup>⑩</sup>。对地方志产生过程的关注,也诱发了学者对明清江南市镇经济研究模式的反思。明清江南市镇一直是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通过地方志的记载来描述江南市镇数量的增长过程,成为许多学者论证明清两代江南区域开发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然而,新近有的学者对此研究思路提出了修正。游欢孙以明清以来常熟、

① 李晓方 《崇文向学与尚武好斗: 明清历修〈赣州府志〉对赣南民风的表达》,《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② 谢宏维 《文本与权力: 清至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地方志分析》,《史学月刊》2008年第9期。

③ 罗艳春 《教育、宗族与地域社会——清中叶江西万载书院再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8年第9卷。

④ 程美宝 《由爱乡而爱国: 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⑤ 〔日〕佐藤仁史 《清末民初在乡知识分子的文明观与乡土观》,《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2006年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⑥ 余新忠 《明清时期的孝行与家庭生活——以江南方志记载为中心的解读》,张国刚主编,《中国家庭史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⑦ 钱杭 《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历史授权——萧山湘湖史上的〈英宗敕谕〉》,《史林》2004年第6期。

⑧ 李文良 《清初台湾方志的“客家”书写与社会相》,《台大历史学报》2003年第31期。

⑨ 〔美〕范德(Edward L. Farmer): 《图绘明代中国: 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0年第2卷。

⑩ 王明珂 《19世纪民族地方志描述视角的变迁——以乾隆、道光、光绪本〈凤凰厅志〉比较研究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吴江二县市镇数量增长所呈现的巨大反差为例,研究认为这不但与二县面积、自然地理环境、农村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而且还与各自地方志对市镇的界定标准和写作背景密切相关<sup>①</sup>。游欢孙的研究,不仅为明清江南市镇经济和任何利用方志数据作为资料基础的统计研究敲响了警钟,而且丰富了我们对方志所提供数据意义的认识。

在边疆民族地区,方志文本又潜藏着独特的边地与民族内涵,有的学者从民族学与历史学的双重角度进行了探讨。张新民基于贵州民族地区的地方志,做了一系列颇富新意的研究。他认为明代贵州方志纂修普遍化和通常化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当地学者渴望进入中心的边缘性焦虑和大一统冲动;而其叙事倾向,又清楚地反映了传统士大夫的文化觉醒和立言不朽的价值诉求<sup>②</sup>。谭必友通过梳理19世纪的3部《凤凰厅志》对民族地区描述的对象与视角的变迁,揭示了其时的社会精英对少数民族试图引领的方向<sup>③</sup>。

#### 四 简要的评述与展望

综上所述,其一,中外史学界对地方史志的利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对地方志的利用从古至今经历了一个由小心谨慎到大胆使用的过程。二是地方志业已成为学者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史料,尤其成为学者构筑明清区域史的资料基础。三是学者在利用地方志时,对方志素材多有批判,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鉴别其真伪和判断其价值(如上述何炳棣、曹树基对明清人口数的考辨),而无意于探讨志书编纂本身的意义。四是学者在利用方志时,一般不太注意对方志史源的考辨,不太考虑方志记述的加减或变化过程。上述特点(这里说“特点”而不言其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考虑到这些问题超出了史料利用者的研究范畴),提示了我们研究地方志本身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若干努力方向。

其二,综观自清至现代方志学界对传统地方志的讨论与批评,不难发现,方志学家均有着共同的目标追求,即为了现实地方志的编纂寻求理论依据,并试图将自己对地方志的理想设计转化为编志指南。所不同的是,清代章学诚对方志的批判,其实际效果是揭露了以往地方志中非“史”性质的一面,恰恰相反,现代方志学家更想彰显的是地方志作为“史料”价值的一面。这一转变正好契合了上述史学界在将地方志作为史料利用由小心谨慎到大胆利用的发展历程。更为重要的是,清代方志学家对传统方志的批判,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传统方志的一般编纂过程及其特点,以及地方官员、士绅、文人、宗族等各种势力对方志编纂的影响;而现代方志学家则充分注意到传统儒家思想与阶级观念在方志中的渗透。不过,方志学界的研究显然不能令人满意。首先,因受制于研究主题,方志学家指出了传统方志中存在的“弊病”,却没有将这些“弊病”置于特定的时空和方志文本中进行深入分析,故其论述与批判难脱空疏气息。其次,方志学界对传统地方志的批判,往往是共时性分析,而缺乏历时性的维度,因此我们无法通过其批判看出不同时期方志编纂者的观念变化。再次,现代方志学家充分注意到阶级观念与儒家思想在方志编纂中的渗透,却没有注意到其他诸如地方观念、族群意识等因素在其中的复杂交织,至于这些因素在

① 游欢孙《地方志叙事“小传统”与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数量增长——兼论1929年与1934年的“商业镇”与“自治镇”》，《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

② 张新民《大一统冲动与地方文化意识的觉醒——明代贵州方志成就探析》，《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冬之卷《地方性知识的文本世界——贵州地方志编纂源流考论》，《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

③ 谭必友《19世纪民族地方志描述视角的变迁——以乾隆、道光、光绪本〈凤凰厅志〉比较研究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地方志中的渗透机制，自然也超出了方志学家的研究范围。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再作纵深探讨。

其三，新近社会文化史视域中的地方志研究，对挖掘方志背后的权力、观念、目的、意识等因素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研究视角独特新颖，研究方法趋于多元，观点结论亦颇具冲击力。但其研究，也留下了不少盲区和有待深入之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学者充分注意到谁在编纂方志，并以此作为揭示方志权力观念的切入点；但是，至于谁在读方志，或者说方志是为谁而“生产”的问题，却普遍缺乏思考，这难免影响到对地方志性质的总体把握。第二，学者着重揭示方志中暗含的权力、观念等因素，却对这些因素渗入方志编纂的路径、机制缺乏具体而微的探讨。第三，方志中固然包涵权力观念等因素，但是，编纂出理想的方志，也是大多方志编纂者的普遍追求，学界对方志编纂者的此种努力及过程，显然多有忽视和偏废。第四，或许正是在上述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学者似有泛权力与观念分析的倾向，研究者的目光多聚焦于方志为何如此呈现，却放过了同样重要的方志呈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从而忽视了权力与观念渗入县志编纂的边界与限度，似有“过度诠释”之嫌。要克服这些问题，将方志编纂置于特定的时空之中进行全面的讨论，或成必然之势。

简而言之，传统史学界试图从地方志中过滤出可靠的信息，以验证研究者预设的某种历史事实。这一研究范式，并不太看重地方志本身的结构过程，地方志只不过是适时登场的配角，偶加利用的道具。在方志学界，地方志自始至终是表演的主角，遗憾的是，这个主角却往往被架空在缺乏特定时空人事背景的虚幻舞台之上。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研究，则显示出了超越上述两种研究范式局限的雄心，他们既盯着地方志，更不愿放过“生产”地方志的人及其权力意志，试图在这二者之间寻求出某种逻辑关系。这一研究取向，无疑将地方志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不过，这类研究还是零星少见的，尚处起步阶段，还有不少空白大有可为。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方向，应当秉持社会史之总体史的理念，将研究目标锁定在一定的历史时空，多做具体而微的个案剖析，通过对对应这一历史时空的地方志的层累过程的解构，我们不仅可以梳理出这一历史时空中的方志编纂史以及方志编纂者的认识史，也完全可能以小见大，借此重建和阐释其中更为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内容。因为地方志作为一种文本，它不仅是人们对区域历史的一种认识和表述，也是整个区域历史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于地理空间的选择，笔者以为或许以县域为宜。因为县志占据着现存方志的绝大部分，大多县域均存有多种不同历史时期的版本，便于作历时性分析。更重要的是，县志是官修方志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它是总志和省府州志的辑史来源，既贴近民间生活，又反映了国家的政治要求和主流意识形态。当然，要通过地方志这“沧海一粟”，映射出区域社会的“总体史”，我们不仅要有跨学科的理论方法的储备，更需眼光向下，走出书斋，走进田野，做百姓的学生。

（联系地址：上海市东川路 500 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邮编：200241）

本文责编：詹利萍



## **Construction , Guangdong Provincial Records ( 1979 – 2000) ” as an Example** .....

..... **Wang Tao ( 20)**

In order to fully reflect the status of ide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 and to reflect the major changes in people’ s thoughts and morality during social evolution , we set up “Special Accounts: Ide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Guangdong’ s second – round provincial records. Although “Ide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 Scripts for Second Review) has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recorded ideological civilization creation and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 it still has problems of narrow coverage , lack of depth , and the tendency of being identical to official documents. Over – reliance on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in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 unstable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team , singular source of reference materials , narrow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 and lack of compilation paths such as social feedback , are all main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To break up this kind of reliance , to uplift the quality of provincial records compilation , and to eventually realize the virtuous cycle of compilation – usage – compilation , the follow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can be taken: perfecting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system to break up over – reliance on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paying attention to collection and textual analysis of local information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to break up over – reliance on archive materials; cultivating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specialists to eliminate the phenomenon of knocking together temporary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team; strengthening local information research to eliminate the phenomenon of thousands of local records having only one face; and enhance capability in communication to eliminate the phenomenon of “the emperor’ s daughter worries not about marriage”.

## **Narrative Comments on the Utilization and Research of Local Records under the Vision of Social History** .....

..... **Li Xiaofang ( 26)**

Local records are not only the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 but also the object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raditional history studies , local records are more often than not seen as historical reference materials used to reconstruct and explain social historical process. The local records circle has all the while seen local records as objects of research. Based on the current spotlight on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 there has been no lack of criticisms on ancient local records bearing social history significance. Under the vision of recent social cultural history , local records are seen as kind of “texts” , and revealing the implicated power , conceptions , objectives and meanings , became the basic research orientation of related scholars. Through combing and narrative comments , one can see from a social history angle , a path to further deepen local records research.

## **Brief Discussions on the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Local Records** .....

..... **Liu Chengdong ( 34)**

To carry out the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cultural resources of local records better and deeper , and to develop in a healthy and orderly way , we must constantly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n the function , value , and significance of local records. In summary , it is to serve for “five constructions”: for political construction , for economic construction , for cultural construction , for social construction , and for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Since the start of newly compiled local records work 30 years ago , the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local records have made tremendous achievements. We have compiled and published local records reference materials by category , published a range of local information series , succeeded in local information network construction , and carried out academic research with the help of local records. We should collect local records documentation and materials more extensively; have well – compiled reference books such as local records indexes and local records reference materials by category; further improve the sorting – out work of old local records; have well – compiled local records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records network; quicken the strategic pace of local records and yearbook integration; and safeguard the quality of second – round local records.

## **Tentative Remarks on the Compilation of Second – round Local Records** ...

..... **Yao Jinxiang ( 39)**

There are indeed deficiencies in second – round local records in comparison with first – round local records , such as weak readability , over – extended length , too many praises on achievements while hiding errors , and too many accounts on “works” , with many of these problems even exist in the phase of local records scripts. However , these problems also existed during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first – round local records , belonging not to second – round local records alone. And hence it is still premature to conclude that second – round local records are inferior to first – round local records. In comparison with first – round local records , second – round local records have some obvious strong points , i. e. more reasonable and sound content structure , sharper time and local features , more comprehensive and reliable reference materials , and